



# 宋代墓葬年代学研究方法初探



吴 敬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摘 要:**本文归纳了目前对宋代墓葬断代研究的主要方法,总结了纪年断代法、横向对比法以及参考铜钱断代法的利弊所在。提出研究者在对宋代墓葬进行断代时要在材料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对比各类材料,这样才能对墓葬的年代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关键词:**宋代墓葬;年代学;研究方法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e main method of the study about the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we summari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bout the way of numbering the years, and the lateral comparison, and the reference of the copper cash. Then we put forward that the researchers should compare much more materials if the material is enough when they estimate the period about the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so we will have the more accurate knowledge about these tombs' period.

**Key words:** the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chronology; research methods

宋代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北宋(960~1127年)、南宋(1127~1279年)共历320年,这一时期在其统治区域内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墓葬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之一。宋代墓葬是宋代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它的研究可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对原始资料的归纳和总结可以了解宋人的葬俗;二是在第一层认识的基础上,探究宋代各地葬俗的流变与交流;三是通过墓葬所折射出的习俗来探究宋代社会的文化取向和思想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宋代社会的面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需要对墓葬的年代或年代范围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也就是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常提到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本文是笔者在对宋代墓葬材料整理和研究过程中的一点心得,同时也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宋代墓葬年代学研究的一个小结。

## 一、宋代墓葬断代方法举例

目前的考古简报或报告中,对宋代墓葬年代的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通过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墓碑、地券或是墓室题刻等文字材料,直接断定该墓的绝对年代,这些墓葬也称为“纪年墓”。

2. 将无纪年墓的墓葬形制或随葬品与年代确定的资料相比较,从而来判断前者的年代,这种类比所得到的是一个年代范围,即墓葬的相对年代。目前对于宋墓相对年代的称呼较多,主要有: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北宋晚期、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北宋早中期、北宋中后期、两宋之交、南宋早期、南宋中期、南宋晚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在材料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还有墓葬的仅定为北宋墓葬、南宋墓葬或宋代墓葬。

3. 通过墓葬出土的铜钱来判断墓葬的相对年代,这得益于两宋时期铸造了大量的年号宝文钱。从理论上说,这种判断只能说明墓葬的年代不早于该墓出土最晚年号铜钱所处的年代,若要更进一步确定其年代范围,还需要结合其他信息进行分析。

## 二、宋代墓葬断代方法分析

上述的三种方法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也可以说是被广大学者所默认为,每种方法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些方法又都存在着各自的弊端,以下就针对这三种主要的宋代墓葬断代方法的合理性及其弊端进行分析。

### 1. 直接断代

利用文字资料断定墓葬的绝对年代,其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断代之前,有

两个问题需要了解：

(1) 墓主人的下葬年代与墓室的建造年代。目前对宋代墓葬绝对年代的断定,学术界普遍以墓志等材料所记载的墓主人死亡年代、下葬年代或迁葬年代为该墓的绝对年代,但是,大家往往忽视了墓葬的建造年代。宋人有生前为自己营造墓室的风俗,如成都金鱼村 M5 出土了两方墓券,一方镇墓券记载了墓主人吕忠庆于淳熙九年(1182 年)建造了该墓,以祈求延长寿命,另一方买地券记载了墓主人吕忠庆下葬于嘉定四年(1211 年),前后间隔 29 年。而且,宋人普遍相信风水占卜之术,墓志、地券中屡见“卜葬”一词。这就造成了墓主人的死亡时间与下葬时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一时段短者几天,长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墓室可能在占卜之后便已修建。因此,墓主人的下葬年代在一定的情况下是要与墓葬年代区别对待的。如果墓葬形制与前一阶段的形制接近,而记载的下葬年代却是后一阶段,则不必僵硬地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可以视情况将两者拆分,这样更有利于把握时代特征。如果墓葬形制符合本阶段特征,而记载的下葬年代并没有超出这一特征所持续的时间范围,则可以将两者作为同一年代的遗迹单位进行研究。

中原、北方地区的仿木结构砖室墓有不少是多次开启葬入墓主人的,此类墓葬的年代学研究原则与这一特点相适应。

(2) 多室墓的绝对年代。宋代流行夫妻合葬,砖(石)墓葬并列多室的现象较多,土坑墓中也有并列多棺的现象。这些墓葬中,有的出土了一件墓志或买地券,记载墓主夫妇合葬于某年,如合肥马绍庭夫妇墓合葬于政和八年(1118 年)。有的出土了多件墓志或买地券,分别记载了墓主夫妇的下葬年代,如成都谢定夫妇墓出土的两件墓志分别记载两者下葬于元丰八年(1085 年)和元祐八年(1093 年),成都张确夫妇墓出土的两件墓志记载两者均下葬于元祐八年(1093 年),成都宋京夫妇墓出土的两件墓志记载宋京下葬于宣和七年(1125 年)、其妻下葬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从墓葬形制来看,下葬年代相同或间隔不久的谢定夫妇墓、张确夫妇墓的双室在构造和对称性方面完全一致。宋京夫妇下葬年代间隔 26 年之久,且跨越了南北宋,宋京墓为双层券顶,其妻墓为单层券顶,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风格都有较大差异。

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即不少墓葬仅在一个墓室

中出土了墓志或买地券,或是两个墓室中都有出土,但其中一室的材料已漫漶不清,此时就要对这些墓葬进行具体的分析。从双室均有确切年代的墓葬来看,同一时期修建的双室墓构造完全对称,这种墓室应是在先逝者死后同时修建了其配偶的墓室,这是古人夫妇生则同房、死则同穴丧葬观的反映。有的地券中有这样的记载,如广元河西公社仿木结构画像石墓,该墓为并列双室,两室对称性结构和墓室石刻风格完全一致,东室地券记载墓主人葬于庆元元年(1195 年),西室地券字迹多已不清,但有“起□坟堂以待百年将为宅兆……”的记述,这符合宋人生前为自己营造墓室的风俗。因此,对于仅有一方记载确切年代的双室墓,若是结构完全对称,则其修建年代应相同,如成都龙泉驿青龙村 M2 为并列双砖室墓,左室地券记载墓主人下葬于嘉祐七年(1062 年),两室结构完全对称,应为同时修建。若要为后逝者再修建与先逝者完全一样的墓室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墓室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则其年代应有先后,如成都化成 M5 为并列双砖室墓,左室出土的地券记载该墓的年代为端平二年(1235 年),两室平面不对称、砖砌结构不一致,应不是同时建造的墓室,对其原因就要具体分析。

目前报道的宋代纪年墓,多数可以将墓室的建造年代和下葬年代、多室墓各室的年代归为同一时期。但是也有较为特殊的现象,如前文所列的成都金鱼村 M5、成都宋京夫妇墓等。尤其是福州许峻夫妇墓更为特殊,该墓石圻、砖椁结构,三室的构造完全一致,并且墓砖上有铭文“淳祐拾年”(1250 年),可见该墓三室同时修建于这一年,属于南宋晚期。但是三室各出土了一方墓志,分别记载陈氏葬于 1250 年、许峻葬于 1272 年、赵氏葬于 1287 年,显然赵氏的下葬年代已进入元代纪年,其随葬品从一定意义上讲应属于元代初期。

因此,在使用直接断代法之前,需要谨慎地对待材料,尤其是要对墓葬的建造年代和下葬年代、多室墓各室的年代加以甄别后再进行研究。

## 2. 横向对比断代

宋代墓葬中纪年墓发现的比例是较低的,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墓志、买地券或其他可以断定绝对年代的资料,这就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进行断代。宋代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器物也可以成为断代的依据。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三类:

(1)无纪年墓的材料与纪年墓以及其他纪年材料的对比。从墓葬形制上来看,河南、河北、山西等中原和北方地区宋金时期流行的仿木结构砖室墓来源于仿木结构建筑,根据仿木结构建筑的流行年代来大致判断墓葬建造的年代,如宿白先生对于白沙第二、三号墓的年代判断。南方地区两宋时期以砖室墓和土坑竖穴墓为主,土坑竖穴墓结构简单,基本不能以它作为断代的标准。砖室墓的发现和报道很不平衡,多数地区的长方形单、双室纪年砖室墓在两宋时期没有呈序列的演变趋势,船形砖室墓大致流行于湖北东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以及浙江北部,形制逐渐简化,至南宋时期消失。整个南方地区仅有成都市及其周边地区报道的宋代砖室墓可建立纪年墓形制的年代标尺,其发展趋势大致是北宋时期由简单到复杂,南宋以后又逐渐简化,无纪年墓的特征也基本符合这一演变趋势。从随葬品上来看,无纪年墓的随葬品中主要有瓷器、釉陶、金银器等可以与纪年墓出土者进行对比。这些器物具有较强的时代性,而墓葬中的随葬品多数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物,通过这种对比确定无纪年墓的年代范围还是比较可信的。

(2)无纪年墓出土的瓷器与窑址出土同类器的对比。宋代窑业繁荣、窑口林立,各地都有许多知名的窑场,目前,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耀州窑、梁子湖窑、繁昌窑等窑址都积累了大量的发掘材料,窑址的分期体系已初步建立,这为宋代瓷器的窑口归属和年代判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窑址出土的器型丰富,无纪年墓的随葬瓷器可以与窑址分期体系相对比,从而得到该墓的大致年代范围,这一对比的结果也是较为可信的。值得一提的是,窑址分期体系所参考的标尺恰恰是纪年墓出土的瓷器,而窑址分期中各期所涵盖器型之广,又起到了弥补纪年墓材料不足的缺点,为无纪年墓的断代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材料,这种方法可谓是墓葬和窑址材料的互证。

(3)无纪年墓的材料与已有分期研究成果的对比。宋代墓葬的材料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目前已有学者对各地的材料进行了分期研究<sup>①</sup>,这为新材料年代的判断提供了较好的标尺。但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取代宋代墓葬的分区,而是要以材料为依据进行分区,而且要尽量避免为了分期而分期,要以材料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出发,并结合宋代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期,这才是透物见人之举。对于一些器物的年代学研究,也可以借鉴<sup>②</sup>。此

外,还有“都省铜坊”铭文镜和“湖州镜”在宋代墓葬的年代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都省铜坊”铭文镜是五代时期南唐和吴越国流行的铜镜,入宋以后,逐渐减少,从目前的材料看,北宋前期在原南唐和吴越国统治区仍有使用,而后才逐渐消失。“湖州镜”产于浙北,在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可见的“湖州镜”是北宋晚期纪年墓中出土的<sup>③</sup>,而其他地区在纪年墓中出土的“湖州镜”均为南宋时期。由此可以推断,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都省铜坊”铭文镜的宋代墓葬年代可能多在北宋前期,而两宋时期除浙江、苏南地区以外,其它地区出土“湖州镜”的墓葬应至少可定为南宋时期。

横向对比断代的方法是在分期研究以及以分期研究为基础的深层次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也是大家较为认可的。但是,通过横向对比断代判定宋代墓葬的年代不可能达到直接断代法的绝对年代,其对比结果是一个相对年代范围,墓葬的具体年代在这个年代范围内可早可晚,这是其自身局限性所决定的。

### 3. 以铜钱为依据的综合断代

宋代改元频繁,两宋十九帝共使用过57个年号,每逢改元多铸造年号宝文钱或与年号相关的宝文钱<sup>④</sup>。宋代墓葬中随葬铜钱的现象较为普遍,少者几枚,多则几百枚,因此宋代的宝文钱也为宋代墓葬的断代提供了间接证据。但是,一些研究者并没有对铜钱的参考价值进行分析,便直接将墓葬年代定为最晚年号铜钱的铸造时期或是其后不久,这种断代是较为草率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出土铜钱不多、涵盖年号较少的情况下,最晚年号宝文钱要结合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特征对墓葬进行断代。首先,要确认的是最晚年号宝文钱的铸造年代,如一座宋代墓葬出土了景德元宝、元丰通宝两枚铜钱,则可以确定该墓的年代不早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的最后一年,即元丰八年(1085年),其年代范围应在1086年至1279年之间;其次,要结合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时代特征进行综合分析,此时就需要使用横向对比断代,在符合1086年至1279年这一时间范围内确定其大致的年代范围;最后,根据目前通用的宋代相对年代概念,将此墓定为北宋晚期或是南宋时期的某一阶段。

有些墓葬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但许多字迹已难以辨认,此时铜钱就不能作为首选依据来确定其相对年代范围,这种情况更多的是要使用横向对比断代,在横向对比断代的同时,参考自己清晰的



表 一

墓葬地点	出土宋代铜钱	绝对纪年	出 处
南城 陈肃墓	太平通宝、咸平元宝、祥符元宝、景祐元宝、 皇宋通宝(1038~1054 年)	1056年	《江西文物》 1989 年第 2 期
九江 蔡桥村	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天禧通宝、元丰通宝 (1078~1085 年)	1085年	《考古》 1991 年第 10 期
合肥 马绍庭夫妇墓	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祥 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至和元宝、嘉祐 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 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1111~1118 年)	1118年	《文物》 1991 年第 3 期
泰州 蒋师益墓	太平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至和元宝、嘉祐通宝、治 平元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大观 通宝、政和通宝(1111~1118 年)、有 2 枚不详	1123年	《东南文化》 2006 年第 5 期
温州 赵叔仪夫妇墓	太平通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通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 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至和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熙宁 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大观通宝、政和通 宝、宣和通宝(1119~1125 年)	1159年	《东南文化》 2006 年第 4 期
武昌 卓刀泉 M1	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嘉 祐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丰元宝、元祐通宝、政和通宝、 绍熙通宝(1190~1194 年)	1213年	《考古》 1964 年第 5 期

铜钱的年代。

(2)出土铜钱较多,钱文的年号具有连续性,可以参考最晚年号宝文钱的铸造年代进行断代。这种断代方法来源于对纪年墓出土连续年号铜钱的统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报道的出土连续年号铜钱,且有墓志、买地券等资料记载准确年代的宋代墓葬有 30 多座。这些墓葬的绝对年代绝大多数与该墓出土最晚年号宝文钱的铸造年代相吻合,或是在铸造年代之后不久的某年,本文不能一一列举,在此仅举几个例子,参见表一。

这种连续年号宝文钱断代法相对来说是较为准确的,尤其是出土铜钱的连续年号截至于北宋中后期的墓葬,从一定意义上讲其精确程度仅次于直接断代法的绝对纪年。但是,在利用这一方法时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从目前的材料看,太祖至真宗时期随葬铜钱的数量不多,如果墓葬仅出土了这一时期的几枚铜钱,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同时务必要参考其他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否则经常会出现墓葬中随葬这一时期铸造的几枚铜钱,但年代却是北宋晚期甚至南宋时期的情况;第二,南宋时期,战争破坏、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农业残破等原因造成了经济的衰退和贫富差距的拉大<sup>⑮</sup>,且铸币业衰退明显<sup>⑯</sup>,使南宋墓葬随葬铜钱的比例和数量都较北宋中后期大大下降,远离南宋统治核心地区的偏远地区墓葬中随葬南宋年号宝文钱的现象就更少。因此,对于出土铜钱的连续年号截至于北宋末期(政

和、宣和、靖康年间)的墓葬,要谨慎对待,如武汉青山任忠训夫妇墓(1256 年)随葬连续年号宝文铜钱中最晚为宣和通宝<sup>⑰</sup>,德安周氏墓(1272 年)随葬连续年号宝文铜钱中最晚为政和通宝<sup>⑱</sup>。根据这一特点,如果无纪年墓的随葬品符合北宋晚期特征,且出土最晚年号铜钱为北宋末期铸造,则将其定为北宋晚期或末期墓葬,如果没有明确的随葬品可定为北宋晚期,原则上应将其定为南宋时期,至少是南宋前期。对于随葬南宋铜钱的墓葬,在判断其年代时也应适当地将其向后延长一个时期。

### 三、小 结

综上所述,对于宋代墓葬的年代学研究是宋代墓葬各项研究得以开展和深入的前提和基础,而目前学术界所惯用的几种方法又都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这些方法在运用过程中是互相依托的,因此,在对单座墓葬进行断代时对不同的材料就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甄别,应尽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年代判断基本准确的基础上。

本文是针对宋代墓葬研究所得的一些认识,但是这些方法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历史时期墓葬的年代学研究,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

注释: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砖室火葬墓》,《考古》1997 年第 10 期。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年第3期。

刘骏:《成都东郊北宋谢定夫妇墓清理简报》,《成都文物》1995年第2期。

翁善良、罗伟先:《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文物》1990年第3期。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北宋宋京夫妇墓》,《文物》2006年第12期。

四川省博物馆、广元县文管所:《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6期。

朱章义、刘雨茂、毛求学:《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278~293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冯先成、程远福、张丙奎:《成都市外化成小区南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242~251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第10期。

宿白:《白沙宋墓》,第79~81页,文物出版社,1957年。

⑪ a.林忠干:《福建宋墓分期研究》,《考古》1992年第5期;b.黄义军:《湖北宋墓分期》,《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c.陈云洪:《试论四川宋墓》,《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d.赵明星:《宋代仿木结构墓葬形制及对辽金墓葬的影响》,《边疆考古研究》(第4辑),第210~237页,科学出版社,

2005年。等等。

⑫ a.周世荣:《湖南出土盘口瓶、罐形瓶和牛角坛的研究》,《考古》1987年第7期;b.杨后礼:《江西宋元纪年墓出土堆塑长颈瓶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等等。

⑬ 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第19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⑭ 宋代铸造的宝文铜钱,多数是以年号为名,如“xx通宝”、“xx重宝”、“xx元宝”,但是也有几种铜钱并不以年号为名,是因为年号中有“宝”字或年号不便作为钱名。目前所见宋代与年号相关的非年号宝文钱有宋仁宗宝元年间至皇祐年间(1038~1054年)铸造的皇宋通宝、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1101年)铸造的圣宋元宝以及宋理宗宝祐年间(1253~1258年)铸造皇宋元宝(李如森:《中国古代铸币》,第214~21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⑮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第307~31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⑯ 陈振:《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第529~5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⑰ 武汉市文物处:《武汉市青山宋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⑱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

(上接第132页)

《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⑳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金坛连山土墩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年。

㉑ 朱江:《江苏南部“硬陶与釉陶”遗存清理》,《考古通讯》1957年3月。

㉒、㉓ 邹厚本:《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㉔ a.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县浮山果园西周墓》,《考古》1977年第2期;b.镇江博物馆:《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考古》1979年第2期;c.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2年;d.南京博物院:《江苏高淳县顾陇、永宁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2年;e.镇江博物馆:《江苏溧水县柘塘、乌山土墩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2年;f.镇江博物馆等:《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年第4期。

㉕ a.南京博物院:《江苏丹徒南岗山土墩墓》,《考古学

报》1993年第2期;b.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2000年第9期;c.南京博物院等:《江苏金坛连山土墩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年。

㉖ 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㉗ 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2年。

㉘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㉙ a.邹厚本:《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b.林留根:《土墩墓的渊源及其葬俗》,《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㉚ 《左传》成公十三年。

㉛ a.王世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考古》1981年第5期;b.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概述》,《考古》1981年第5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